

1005



泗陽文史資料

第八輯 92

泗阳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
泗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

目 录

- 十九、泗阳人瑞史话……………严寿夫（116）
二十、抗战期间商震在重庆…………王志远（120）
廿一、韩恢组织新军攻打泗阳城…………刘良耕（133）
廿二、忆韩德勤的往事片断……………王元嶸（136）
廿三、除掉汉奸韩同虎……潘子美口述 华泉 整理（142）
廿四、抗战时期的泗阳谈氏土纺机……………谈嘉德（146）
廿五、泗阳县长王士昶（补遗）……………桃源老人（149）

张学同在泗阳农场

张学同，泗阳王集乡人。生于1913年，6岁父亲去世，16岁时母亲病故。成为孤儿后，靠替富人帮工，为资本家推脚力维持生计。1940年参加革命，1942年入党，参加过游击斗争，机动南下。建国后，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在国营泗阳农场，带领群众将一片飞沙滚滚的废黄河滩建成“粮棉高产冠淮阴，农林牧副齐发展”的先进农场，1958年12月，泗阳农场被评为农业先进单位，张学同同志被评为农业先进工作者，参加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并进入主席团。1959年，张学同同志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获国务院金质奖章。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先后四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委员长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0年，中共淮阴地委向全区发出《关于开展学习张学同运动的决定》。自此，张学同和泗阳农场蜚声大江南北。

艰苦创业的宏图大志

泗阳农场创建于1951年。这里位于废黄河南岸，原是一片连茅草都长不好的沙灰窝。一阵风过，天昏地暗。那些出土的禾苗不是被厚厚的沙灰覆盖，就是根须裸露朝天。

当时的群众形容说：“撒种一千瓢，收回半葫芦”。土质瘦薄、地貌恶劣、设备简陋、资金匮乏。这就是泗阳农场当

时的场情。

有的干部认为“农场没出息”，调进来，时间不长，又拍拍屁股离去了。群众说他们是“脚面支锅，踢倒就走”。

张学同却毅然决然地来了。他一开始就与众不同，他认为“农场大有出息！”他冲着“好干部不到农场工作”的舆论，大唱反调，“调来农场工作的就是好干部，我就是要在农场蹲一辈子！就是要干好！”

他心雄志大，艰苦创业，白手起家，他的目标只有一个：彻底改变农场的落后面貌。

他把农场广大群众的事业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并立志为之献身。他于1954年8月调到泗阳农场任副场长，第二年9月，他得了“肠阻塞”，开刀后，伤口还未痊愈，他就回到场里，穿起草鞋，扛起锄头，拿起铁锹和工人奋战在一起了。

1956年下半年任泗阳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

他在党团聚会上这样鼓励大家和自己：“如果我们不能为农场树立威信，就说不上对党的忠诚”。“一定要把农场办出个样子来，为社会主义树红旗”。

当时的中共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泗阳县委书记黄克明等都寄厚望于张学同和泗阳农场。

每当想到组织上和领导期盼的目光，张学同就既焦急又兴奋。

即使是取得成绩后在北京开会，他也是人在北京，心在农场。白天听完报告，晚上不去礼堂看演出，躺在床上琢磨下一步的计划：扩场、开河、兴办工业……他时刻在头脑中描绘废黄河滩上的宏伟图景。

他如此热衷于党的事业，热衷于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其阶级根源的：他苦大仇深，解放前一家四口，只有一亩四分可耕地，父亲远到盐城一带帮人推东西，累伤了身体，才32岁就抛下一家径自去了，姐弟俩跟着可怜的妈妈生活，常常揭不开锅，母子三人只好坐在床上哭。16岁那年，军阀混战，烧掉了他家的房子，妈妈一病不起，死在舅奶奶家的西墙下……，是党拯救了他这个孤儿，是社会主义给了他温暖的家，他觉得自己不是自己的，是党的，只有将全身心毫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对得起党。

他不止一次地说：“为党干事业，怎么累我都情愿”。

从1954到1957年，他带领农场干部群众苦战三年，把2300多亩荒漠凄凉的废黄河滩，改造建设成了一个先进农场，1957年，全场除了大片幼林、桑园和防风林等还没有收入外，有收入的1070亩土地，除去成本、工资、行政开支和基本建设投资外，还上交给国家38000元，平均每亩上交35.6元。1958年，上交利润78000元，平均每亩上交73元。1959年上交利润12万1千元，平均每亩上交利润115.5元。此外，还有苹果苗21万株，收入65000多元；红花、薄荷、留兰香、大生地药材9亩6分，收入5200元；养蚕96张，收入3600元。还培植了核桃苗、银杏苗和葡萄苗8万多棵，另有猪羊578头，牛、驴、马、骡56头，鸡、鸭、鹅、兔500多只……农、林、牧、副，共同发展，使泗阳农场从此成为全区农业生产的一面红旗，为苏北赶江南树立了榜样。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他没有架子，一向和我们打成一片”。这几乎是农场干部职工对张学同的一致评价。

他有权不专权，场内每有重大事件，都要经过场务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讨论。

遇事和群众商量，虚心向群众学习，及时采纳群众的合理化建议，这是张学同工作方法的根本点。

1958年春，农场桑园有70多棵桑树急等嫁接。但苦于缺乏技术人员，这些桑园原是桑苗圃合并过来的，原有技术员调走了，六、七个技术工人也大多被整编回家，只剩下了一个技工尹志祥。张学同就和他商量，建议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训技术工人，尹志祥爽快答应后，张学同立即挑选出30个工人，连同自己一并参加学习，半个月的训练，大家既掌握了嫁接技术，又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嫁接任务，仅这一项就为国家节约一万一千零七十元。张学同指导农业生产，决不坐在家里，也不象有的干部那样，只背着手在田头地尾转转。他深入现场，亲自参加劳动。这种现场领导的工作方法，既密切了与群众的关系，又能把生产中出现的问题发现和消灭在萌芽状态。

每当年终岁尾总结工作，他都滴水不漏，哪怕是工人最细微的成绩和最小的缺点，他都条分缕析，决不从评语中漏掉。之所以能这样，主要是他平时多和职工谈心，工人们无话不对他讲，甚至有些工人夫妇夜间吵嘴，第二天连邻居都不知道，纠纷就被张学同解决了。他是群众的知心人，群众

也时时事事拥戴他、支持他。

体察群众甘苦，关心职工生活，这是张学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重要特色。他历来反对那种只把群众当牛当马使唤，而不关心其痛痒的作风。生产效益提高后，在他的倡导下，场里设立了医务门诊室、职工子女学校、托儿所、浴室、理发室、缝纫组等，这些福利一律免费，大大减轻了工人负担，使他们精神饱满，安心生产。

每年春节，张学同都要亲自下厨烧饭做菜，又亲自为职工端菜斟酒；有些女职工要离场回娘家看看，张学同又派马车、又派牛车，送去了再接回来。

对于因病和特别困难的职工，张学同更是体贴入微。养蚕工王玉珍有病，他请来医生，等打过了针，病情稍有好转后才离开；饲养员贺青云老婆死了，自己又去淮阴治病，张学同把他四岁的儿子小贺毛带回家抚养许多天；工人沈正平生病住院，家庭比较困难，张学同不让他知道，买几丈布送给他家属做衣服穿；工人姜世超夫妇下田干活，两个孩子没人带，张学同叫自己的女儿去照料。1959年春天，场里许多小孩得了麻疹，他每天都要跑七、八里路到医院看一次，有的孩子好转了回到家里，他又常常利用晚间休息时，在人家门前来回转，听听孩子的动静……。

生活上的关心照顾固然重要，精神上的帮助和政治上的关怀同样不可缺少。张学同特别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许多人转变了，进步了。

会计徐永忠，来农场前接连调转了四、五个单位，他脾气爽直，但有时粗暴任性，野蛮起来甚至揍领导，不少女工被他骂哭过。每次，张学同都要在事后找他谈心，指出正直与粗野

的界限，指出作为干部应具备的品德和作风。他从没有当众给老徐难堪过，但背地却言词激烈，“威信不是强迫群众给的，是靠自己树的；不尊重群众、不带头劳动，有屁的威信！”许多次之后，老徐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工人杨礼志在旧社会当过伪警察，躲懒藏奸，投机取巧，他和谢某某等10多个人，都是出名的懒汉被张学同改造过来的，后来又都在生产建设中作出了成绩。

张学同认为：只有尊重群众、爱护群众，才是我们的工作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

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

张学同来农场之前，就知道农场人员庞杂，职工素质差，生产效益低，年年亏损，群众生产积极性不高。并清楚症结归于吃大锅饭。他来之后，首先整顿组织，加强责任制；而后改善经营管理，实行“三包四定双奖制”。

他将全场按专业性质分为9个队：4个农业队，两个林业队，1个畜牧队，1个试验队，1个服务队。接着进行精简机构和整顿作风。农场原有17个干部，大多数不懂农业，不安心在农场工作，当时群众说他们有八大任务：吃饭、睡觉、看戏、打球、玩扑克、下象棋、骑自行车（当时自行车稀少）、要救济。张学同在县委的支持下，果断地将干部减为3人：场长、管理员、会计。又吸收了一些纯洁上进的青年农民入党，健全了党组织。这样，组织领导就有了保障。

“三包”（包产、包工、包本），“四定”（定人、定时、定量、定质），“双奖”（达到包产者提奖5%，超产

者，超产部分再提奖10%）制度，是张学同实行按劳取酬，改善经营管理的重大决策。

他改固定工资为计件工资加奖励，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扭转了职工吃大锅饭的思想。以养猪为例，每人喂肉猪56头，100斤以内，每头猪每天给精料1斤，青饲料15斤，长肉10两；100斤以上，每头猪每天给精料1.5斤，青饲料20斤，长肉12两，完成定额的奖励5%，超过定额奖励10%。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奖励工资制度，提高了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益。

以1958年为例，全场157个工人中，有71人被评为场劳动模范，58人得了奖金。

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使得泗阳农场的生产效益一年比一年显著，职工的生活水平也一年比一年高。

技术革新的生产实践

泗阳农场农业生产从1957年以后开始突飞猛进，是技术革新、科学种田的成果。

张学同之所以敢于大胆具体地指导农业生产，是因为他真正懂生产、钻研科学技术。无论在耕作制度、还是在种植方法上，无论在农作物栽培技术、还是工具改革上，他都是行家里手。

他在生产实践中注意观察研究，不断积累经验。

1960年1月，他被请到南京农学院讲课，标新立异地把书本上的棉苗“立枯病”称为“卡病”。他曾拔起过许多株棉花小苗，根部青青的一点没病，而靠近地皮的那一段却象被谁

掐了一下，萎缩了，发枯发黑了。他趴到地上望，棉根四周白板板的地面，他想：莫不是雨后地面板结把它勒的吧？一勒上面不接水气不会发枯吗？他马上叫工人拿来豆扒、锄头，还让木工做了一种能伸进棵子里去的很小的小耙，一起给棉苗松土，两天过后，什么药没打，棵棵长得挺直。

防治棉铃虫，他也有自己的诀窍，农药喷打后，棉铃虫为什么久久杀不死呢？他接连两三夜躺在棉花地，观察虫子的活动过程。原来，棉铃虫晚上6点左右出动，吃到凌晨1点钟光景，休息半个钟头，又一直吃到天亮，而后钻进一个大桃子里，美美地睡一整天。白天，人们虽然打药，它保命得很，等逐渐感染了毒性，已是七、八天后了，棉桃损失殆尽。张学同调集大批喷雾器，一齐夜间出动，棉铃虫鲜嫩的皮子一接触药水，纷纷滚落地面，白天太阳一晒，就都瘪了。

“技术是死的，人必须灵活掌握”张学同说。

农学院的师生觉得这位从生产第一线来的农学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风。

为研究棉花怎样才能提前播种，他接连十天将七、八根温度计插在不同深浅地层里，晚上插，半夜或天亮之前各看一次，十天以后，他得出结论：种子播在离地面3公分的地方，地温可保证棉种出芽。后来，农场的棉花便提前4天播种了。

张学同是善于钻研、肯动脑筋的人，他从小没读过书，在革命队伍里勤奋学习，做场长后还常常夜里在席子上、腿上默写生字。省农林厅编写的一套农林、畜牧丛书，他都认真学习，反复研究过了。他每天都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并能和当

时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他学习书本，尊重专家，不迷信专家，注重自己取得的经验，不迷信原有的经验。

有些人认为，棉花长到一定程度，就要加以抑制，否则个“疯长”；张学同则认为：如果肥料施足，将公枝、赘芽抹了，株高叶大并不叫“疯长”，只能多结桃。1957年他们这样做了，有位专家预言：“农场不会收到花的！”结果单产150斤，创造了高产纪录。

“泗阳大棉花”是张学同带领群众刻苦钻研、技术革新的结晶。

张学同做了这样就能联想到那样。搞山芋温床育苗，就想到棉花温床育苗；看到玉米与秋豆间作，就想到棉花与甜菜间作；由棉花温汤浸种，就想到花生温汤浸种，原来花生发芽破土要17天，浸种后，只需要5天，大大缩短了发芽周期。

张学同把泗阳农场大搞技术革新总结为“十改”：改浅耕套耕为条垅深翻；改单垅稀植为高垅双行密植（山芋）；改土床育苗为温床育苗；改土种为良种（全部良种化）；改单作为间作；改重作为轮作；改稀植为密植；改等行距为大小行种植；改畜耕为机耕；改不浸种为温汤浸种（棉花、花生）。

由于技术革新成绩卓著，农场成了泗阳县委指导生产、技术培训的基地。县农科所和农业技术学校都设在这里，县委农工部，县农业局和生产办公室也在场里办公。农科所9位技术干部，有3个在场内进行26种技术试验，其余6位技术干部及时与各地挂钩推广先进经验，许多农业技术性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养猪、植棉、栽桑、种果……许多技术训

练班都来这里举办。

泗阳农场成了农业生产技术革新的大学校。

扎实深入的工作作风

张学同指导农业生产从不浮在表面，他身体力行、作风扎实、深入细致。他一到农场就扑到生产第一线，在各项工作中，样样做出表率。

有的人嫌喂猪工作不好，他就去喂猪；有的人说喂牛不好，他就去喂牛；有的人怕种棉花技术性强、种不好，他就去种棉花。1956年以前职工都不重视积肥，到处人畜粪没人拾，张学同号召大家拾粪，管理员曹玉胜说：“我革命七、八年，岳父又在此地，拾粪多丢人”。张学同同志就带头拾粪，半个月拾了90多粪箕，同时跟职工算肥料与粮食细帐，这样一来，全场职工人人拾粪，个个积肥。

生产劳动对张学同来说，已不是做做样子，他每年都要出工200多个劳动日。

艰苦的工作，他总是干在前头。有一次，场里200多头猪生癩，他每天用可湿性“六六六”和水替猪洗澡，连洗19天，终于把癩子洗好了。

由于经常参加劳动，他对场里的生产、生活情况了如指掌。他不仅能随时随地说出场里多少工人，多少家属，种有多少粮食、棉花，养了多少马、牛、羊、鸡、鹅、鸭，而且可以说出每个工人劳动怎样，家庭生活情况如何，哪块田的棉花有了多少果枝，哪块田已经开始吐絮，多少母猪已经受孕，哪头母猪生了多少小猪，哪匹马、哪头牛的脾气如何

……等等。

为了给条垅深翻的土地复土，他亲自扶犁操作，给队长们做样子，一个队一个队地指导。

有时开干部会，他会突然间提些问题：“今年玉米的行距是多少？”“今年种植安排上要抓好哪十二个字？”而后矫正、解释。

张学同每天都是匆匆忙忙，工人们看不到他是什么时候起床的，有些工人说：“说我们起得早，他已经下田了”，每逢夜里下雨，雨一住他就出去了，看水有没有被堵住，会不会淹了庄稼，如果事情少，他一个人就把它做了，事情多再回来叫人。1957年4月，麦田汪水，他和工人一道赤脚排水，腹部开刀的口子还没有好，劳动过度伤口出血，他回家用热水洗洗贴块纱布又下田了。1959年秋天，一夜大风把玉米刮倒了，工人们一早起来，下田去扶，他扶好几棵，摇摇，看倒不倒，然后叫工人们都照着这样扶。“庄稼不是铁，不能回炉，要特别小心”他嘱咐工人。

他熟悉庄稼就象医生熟悉病人的脉搏和呼吸一样。有的工人说：“场长爱苗如子”。

农业生产季节性强，变化多，作物生长不平衡，而张学同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深入现场，参加劳动，看苗促进，分类促进，一环扣一环，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张学同出身贫苦，深知每一份劳动成果得来的不易，他办事业克勤克俭，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口上。

他一贯坚持以场养场的原则，少要国家投资，并从各方面节约开支。能够不用的钱，坚决不用，该用的钱也精打细算，决不浪费。

1959年春天，场部计划盖10间工人宿舍，但养蚕没有房子，张学同提议，将盖宿舍的钱拿来盖蚕室，有些人不同意，他就说：“人虽然挤一点，但盖起蚕室来，当年就有收入，养蚕结束再住人，不行吗？”大家都笑着同意了。

他自制各种农具，如追肥器、小麦播种器、山芋六眼打孔器，既提高了工效，又节约了大笔经费。

他和管理员王文昌设计了一幢房屋，节约近1000元。

场里的行政管理费，连同干部工资在内，每月不超过200元，全年不足2400元，而1956年以前，仅干部工资就要1150元，全年需13800元。

生产中，他很注意节约成本，为了多积自然肥，减少商品肥料的开支，全场建了13个大粪池、30个厕所，不仅做到场内人畜粪便不浪费，农闲时还组织工人到外边去拾粪，1958年11月份，63个人5天就拾48000斤人畜粪。

场内的基本建设，多半放在下半年。收入没有落实的时候，他总是不肯随便支出。他经常以过日子要量入为出的道理教育会计，教育工人。

秋天，花生收上来了，按县里规定，每人可以留4斤，但张学同告诉大家：国家需要发展油料生产，农场花生好，应当为人民公社保种，工人们后来把下风的比较差的花生扬出来，每家分了一、二斤，其余全都卖给了国家。农场生产的棉花又多又好，工人们留给自己用的，都只是“等外棉”。

张学同自己的生活一向很简朴，粗衣淡饭，夏天戴一个

八角柴斗篷，一家五口只住一间半草房，而把瓦房让给工人住。

1956年调整干部工资级别，县委决定提张学同一级，可是张学同认为，农场还没有办好，他坚决不要。

他身体不好，常闹胃病，工人们建议厨房另外为他做点饭，他坚决不同意。可是工人打场、筛花生累了，他总是要厨房做点好的送到地里去，有时还给上夜班的工人打点酒喝。

他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和场内各项管理规定，场里实行了实物领条制度后，规定损坏公物，要照价赔偿。制度订了不久，他自己打坏了一只大花碗，他马上买了一只新的来。

严于律己，清正廉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如此概括张学同同志的为人，是极为恰当的。

从1954年到1966年，张学同同志在泗阳农场带领广大职工艰苦奋斗、勤俭创业，泗阳农场的惊人变化和光辉成就，是他和广大干群的心血和汗水凝结成的。“文革”期间，张学同受到不公正待遇。

张学同同志长期患有高血压，1979年10月初，任县农水办副主任期间，去王集乡徐庄猪场、曙光、张陈等村了解花生、水稻、山芋产量情况，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979年10月17日逝世，终年65岁。根据张学同遗愿，他的骨灰，一半留在县爱园，一半葬在泗阳农场的公墓陵园内。

废黄河滩上，永远留有开拓者的足迹！

泗阳农场人民，永远怀念张学同同志！

（庄斌 根据有关资料整理）